

孔尚任与桃花扇

洪柏昭 著



孔尚任与桃花扇

洪柏昭 著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8.5印张 2插页 170,000字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450册

ISBN 7—218—00089—4/I·7

*

定价2.55元

《孔尚任与桃花扇》小序

王季思

读了洪柏昭同志的《孔尚任与桃花扇》，首先给我的感受是把孔尚任一生的交游、经历以及文艺创作中的思想活动，感情波澜，都勾勒出来了，我们从中看到孔尚任怎样在康熙皇帝到曲阜祭孔时讲解《大学》首节，得到皇帝表扬，受宠若惊；看到他在黄淮下游治水时目睹灾区人民的流离失所、饥寒交迫，引起内疚的心情；看到他在扬州、南京和明末遗民冒辟疆、杜于皇、宗元鼎、张瑶星等的交游，在思想感情上受到他们的影响；看到他在扬州梅花岭拜史可法的衣冠冢，在南京拜谒明孝陵，对明清之际的兴亡感慨万端。这就重现了他的生活场景和创作活动，把读者引回到那个历史时代，体会到作者为完成《桃花扇》传奇，二十年间三易其稿的苦心孤诣和惨淡经营。

在封建历史时期，一些著名的戏曲作家，从关汉卿、王实甫到洪升、孔尚任，几乎都没有完整的传记流传，我们今

天要把他们的生活和创作传述给今天的读者，除了尽量搜辑有关历史资料、探索作品的历史内容外，还必须用今天的语言把人物的有关活动和思想面貌勾勒出来，使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戏曲作家，而不只是一些纸面材料的凑合。这工作很重要，也很难做，其关键是重大的历史事件，必须有根有据，而人物的日常生活、感情波澜可以根据作家的性格和历史的可能加以想象。如第四章写孔尚任和顾彩合写《小忽雷传奇》时的一段对白，以及他们乘着酒兴，刻烛填词的描写，就不仅是事件轮廓的勾画，还有层层色彩的渲染，其中带有想象的成份。孔顾合写《小忽雷传奇》，既见于孔氏的《桃花扇本末》，确有历史根据，刻烛填词又是前代文人的习俗，这样的想象就属于历史的可能，和背离历史事实，向壁虚造者有别。其积极意义是把孔尚任、顾彩等古代戏曲作家写活了。

其次是柏昭把孔氏生平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来叙写，使读者在理解孔氏的生平与思想的同时，增加了历史知识。如清初统治者的祭孔活动，治河中的两派斗争，明末扬州、南京遗民的文学活动，明末复社文人和秦淮名妓的气味相投等。这些历史知识要有选择，有剪裁。这首先要看是否有利于对作者生活和创作的说明，这点柏昭做得比较好，其次要看是否能引起今天读者的兴趣，这点柏昭似乎做得不够。解放后环绕《桃花扇》的改编、上演、评价，曾引起文艺界的尖锐争论，有的同志曾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，对今天读者来说，似乎应有明确的说明。就剪裁说，有些事例举得多了些，没有

给读者留有举一反三的余地。

其三是对孔尚任的作品作了充分的介绍和较为公允的评价。书中以将近一半的篇幅专章介绍《桃花扇》的成就。前面各章为《桃花扇》从思想酝酿到最后定稿作铺垫；后面有些章节又为《桃花扇》定稿上演后引起的余波作详尽的说明，这是必要的，又是我国史家的传统作法。司马迁的《司马相如传》，全录司马相如的《子虚上林赋》，班固的《扬雄传》全录扬雄的《甘泉赋》、《羽猎赋》、《长杨赋》，就是先例。书中对孔尚任《湖海集》中的诗歌除肯定他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外，也指出他集中有一些颂圣的谀词，庸俗的应酬俗套，有时对自己的贫困生活未免过于夸张等。又如，谈《桃花扇》的宾白时，既肯定了他典雅彩丽的一面，同时指出“作者揭橥‘宁不通俗，不肯伤雅’……从说白的性格化、舞台性看，似有不足。”在论述孔尚任的罢官疑案时，根据孔氏及其交好的诗歌、书札，作了认真的考证，认为他以文字被斥，这文字指的就是《桃花扇》，但仍没有把话说死，说“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明材料，孔尚任以《桃花扇》罢官的说法，也还不能说就是定论”。这就为后学的进一步研究留有余地，态度也比较公允。

最后，更重要的一点是书中第五章从主题思想、全剧结构到人物塑造，全面总结了《桃花扇》的创作经验，为当前历史剧的创作提供借鉴。如第四节介绍《桃》剧在情节提炼中的重要成就是“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，符合规定情境中的相互关系，合情合理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。”接着总结《桃》剧情节的新奇为事奇、情奇、文奇，并用今天的术语加

以演绎：“‘事奇’相当于作品题材的新颖，‘情奇’相当于思想内容的精警，‘文奇’相当于艺术技巧的新奇。”并就《桃》剧举例，分四点加以论述。又如第三节总结《桃》剧人物塑造的经验时说：“戏曲的生命是人物，只有人物能站得起来，舞台上才有戏可看，观众才获得感情的熏陶和净化。”接着又分“对剧中人物长时间的研究、揣摩”，“具有进步的民主思想，能以人民的爱恶为爱恶”，“把人物放在行动中写，通过精心构思的戏剧情节来刻画人物”这三点，具体加以说明。读者在这些论述中举一反三，有所体会，不仅提高了对古典戏曲的欣赏水平，如果他还想写戏，又将从中摸索到一些戏剧创作的窍门。

历史在继续发展中不断在人们面前展现新的场景，提出新的问题。反映历史的著作，不论属于政治方面、经济方面或文化方面的，必将要求学者为推动历史形势的发展，作出新的努力。1957年，我和苏寰中、杨德平共同完成《桃花扇》的校注本，并写了一篇全面论述《桃》剧的《前言》，就是适应解放后的形势要求，为读者提供一点新的看法。从那时到现在，已过了三十年。前人以三十年为一代，这新一代人自然要求学者对孔尚任的生平作出新的介绍和评价。柏昭的《孔尚任与桃花扇》恰于此时完成。他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，反复钻研原著，广泛阅读有关历史资料和近人论著，加以比较、分析，然后审慎地提出自己的结论。我读后不仅个人得益不浅，也为我国古典戏曲的研究工作后继有人感到欣慰，因此乐于向读者谈谈自己一些初步的感受。

小 引

“纵使元人多院本，勾栏争唱孔洪词。”

——金埴：《题阙里孔稼部尚任

东塘桃花扇传奇卷后》

我国源远流长的剧坛，人才辈出，异彩纷呈。继关汉卿、王实甫、汤显祖等人之后，到了清代康熙年间，又出现了两颗照耀长空的巨星——洪升和孔尚任。他们各自创作的《长生殿》和《桃花扇》，风靡了当日的剧坛。“南洪北孔”，齐足并驰，这两位优秀的剧作家，都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探讨。我们在这里将要叙述的，是关于孔尚任的生活、思想和创作，看看这位一代才人，是怎样写出他的不朽作品，他的遭遇又是怎样的。

“文章憎命达，魑魅喜人过。”这是旧时代相当普遍的现象。那些有见识、有才华的人士，往往是抑郁侘傺、坎壈终生的。孔尚任大概也可以归入这一行列。他一生除《桃花扇》以外，还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，与人合作了另一部剧作《小

忽雷》，创作是十分丰富的。但是终生落寞，晚年更加穷困潦倒。了解他的经历，可以使我们对旧时代的压抑人才有更多的认识，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今天的社会，珍惜我们今天的事业。

这里也将重点探讨一下《桃花扇》创作的重大成就，目的是给这部划时代的戏曲名著以恰如其分的评价，提供一点足资借鉴的创作经验。

目 录

《孔尚任与桃花扇》小序.....王季思 (1)

小引..... (1)

一 阙里圣裔..... (1)

 (一) 从动荡走向稳定的时代..... (1)

 (二) 尼山、洙泗之间..... (6)

 (三) 六十四代圣裔..... (10)

二 进出石门山..... (14)

 (一) 少年颖慧..... (14)

 (二) 读书石门山..... (17)

 (三) “出山异数”..... (21)

 (四) 初到北京..... (29)

三 四年湖海..... (33)

 (一) 康熙中叶的治河问题..... (33)

 (二) 在“斥卤波涛之地”奔波..... (38)

 (三) 淮扬结客..... (51)

 (四) 金陵凭吊..... (68)

 (五) “呻吟疾痛之声”..... (76)

四 京国闲曹..... (92)

 (一) 岸堂风月与冷宦生涯..... (92)

(二) 博古闲情.....	(102)
(三) 《小忽雷》的创作.....	(106)
五 一曲喧传《桃花扇》.....	(116)
(一) “三易稿而书成”.....	(116)
(二) “借离合之情, 写兴亡之感”.....	(123)
(三) “写南朝人物, 字字绘影绘声”.....	(144)
(四) “酌奇而不失其真”.....	(168)
(五) “通部布局, 无懈可击”.....	(185)
(六) 高度诗化的语言.....	(198)
(七) 承旧和创新.....	(210)
六 “命薄忽遭文字憎”.....	(216)
(一) 罢官疑案.....	(216)
(二) “恋阙怀乡”.....	(225)
七 寂寞潦倒的晚年.....	(231)
(一) 归田之初.....	(231)
(二) 真定、平阳之行.....	(235)
(三) 漫游豫、鄂、湘.....	(241)
(四) 作客东莱.....	(245)
(五) 最后一次远游.....	(248)
(六) 文星殒落.....	(252)
后记.....	(259)

一 阙里圣裔

（一）从动荡走向稳定的时代

清顺治五年（1648）九月十七日，一位著名的剧作家和文学家在山东曲阜降生了，他就是《桃花扇》的作者孔尚任。

孔尚任，字聘之，又字季重；号东塘，别署岸堂，自称云亭山人。他出生的年代，正是中国大地上改朝换代、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年代。

早在他出生之前四年，崛起于祖国东北的满洲贵族，已经篡夺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果实，建立了大清王朝。这个刚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不久的少数民族政权，在挥军南下统一全国的战争中，实行了野蛮的屠杀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。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；强迫汉人剃发梳辫，改变衣冠、习俗，在在激起了汉人的激烈反抗。孔尚任出生的那一年，南明的弘光、隆武两个小朝廷虽然早已覆灭，但李自成的部将李过、郝摇旗等率领的农民军，却正与永历政权的何腾

蛟、瞿式耜的军队配合，在广西、湖南连续挫败清军，掀起了一次新的抗清高潮。此后，张献忠的部将李定国等人又与永历政权合作，在西南地区坚持抗清斗争，多次给清人以重大打击。一直到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由于内部分裂，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王朝才宣告灭亡。

在东南沿海，张名振、张煌言、郑成功等领导的抗清活动也十分活跃。永历政权覆亡前夕，为了暂时躲避清军的锋芒，郑成功率领军队在台湾登陆，驱逐了盘踞岛上的荷兰侵略者，以台湾作为基地，继续抗清。

永历政权覆灭以后，全国的反清斗争逐步走向低潮。这时，清政府和“三藩”的矛盾却尖锐起来了。“三藩”就是吴三桂、耿精忠和尚可喜。吴、尚和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都是明朝的降将，以镇压农民起义军和抗清队伍“有功”，先后封王。割据滇、黔、粤、闽数省，拥兵自重，严重影响了清朝政令的统一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，清朝下令削藩，他们就起来叛乱。历时八年，波及十省，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破坏。终因名声太坏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，到了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，就先后为清政府平定。接着，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，清政府派施琅大举进攻台湾，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战败出降。延续了四十年的反清武装斗争，至此才最后宣告结束。

孔尚任的青少年时代，我们的祖国，就是处在这样动乱的岁月之中的。他的家乡山东，也曾有过榆园军和鲁东农民军的抗清，一直坚持到康熙初年。不过，就他出生之地的曲阜

来说，却相对的比较平静，没有什么大的骚动。因此，在青年孔尚任的脑海中，也没有留下多少民族斗争的直接印象。但是，明朝覆亡的惨痛事迹，他多少是听到过的，也曾经引起过他的感慨。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讲。

前仆后继的反清武装斗争和治理国家碰到的各种问题，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逐步调整政策，以巩固他们的统治。总的来说，就是在加强镇压反清军事力量的同时，又大力使用了安抚的一手。

入关之初，清政府曾下令圈地，名义上是把“无主之地”分给东来的诸王、勋臣、兵丁人等耕种，实际上是大量圈占民田。结果使得大批农民逃亡，耕地丢荒，直隶等省人民不断掀起反圈地斗争。清政府不得已，于顺治四年、八年、十年先后下令禁止圈地。到了康熙八年（1669），才基本上结束了这一野蛮的措施。

针对清初地荒丁逃、民穷财尽的情况，顺治年间，清政府曾多次下令减免田赋，招集流亡，开垦荒田，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。最早提倡垦荒、屯田的，就是孔尚任家乡山东的巡抚方大猷。他在顺治元年（1644）八月，“以荒地无主者，分给流民及官民屯种；有主无力者，官给牛种，三年起科”。^① 顺治六年（1649），清政府正式下令招徕逃亡民人，把无主荒田分给他们开垦耕种，六年后才征收钱粮。康熙年

^①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七。

间，赋税蠲免的范围和幅度更大，奖励垦荒的办法也更优厚。康熙八年（1669）实行“更名田”，把明朝藩王的土地，给与“原种之人”耕作，使他们成为自耕农。这些政策使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慢慢恢复，人民生活逐步安定。这就为清朝的统一稳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

对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，清政府在政治上也加强了笼络。主要是通过扩大科举取录的名额，把更多的人吸收到政权中来。早在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清政府就开科取士，使“读书者有出仕之望”。考试除正科之外，又有许多特科，如“经学特科”、“孝廉方正科”等。康熙十三年（1674）以后，还实行捐纳制度，地主士绅子弟只要有钱，就可以纳资得官。康熙十八年（1678）举行的博学鸿词科考试，录取了彭孙遹、朱彝尊、陈维崧、汤斌、汪琬、潘耒、施闰章、尤侗、毛奇龄等五十人，都是一时的名士，各授以翰林院官职，入史馆纂修《明史》，更是对汉族知识分子一次极大的笼络。在政府机构中，也适当提高汉族官员的地位。中央六部的尚书，起初只能由满人担任，汉人仅能充任副职。从顺治五年（1648）起，六部设置了汉尚书，省、道、府、县等地方官职也都满、汉分任。并且标榜“不分满汉，一体眷遇”。这些措施对于缓和满汉民族矛盾，扩大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，是起了很大作用的。

不过，清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压制、威慑的一手。满汉统治者的合作并不是平等的。事实上，满官的地位和权力远高于汉官，政权中始终保持着满

人的主导地位。为了箝制汉人的反满思想，清统治者又屡兴大狱。仅到康熙初年为止，就掀起了科场案、奏销案、《明史》案等几个大案。科场案发生于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，清统治者借口考试舞弊，在顺天（北京）、江南（南京）等地兴起大狱，主考官、同考官和举人很多被杀或流放，家产籍没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也遭遣戍。奏销案发生于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清政府以“抗粮”为名，将江南苏、松、常、镇四府的官绅士子一万三千多人，“尽行褫革，发本处枷责，鞭扑纷纷”^①，《明史》案发生于康熙二年（1663），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铨买到明朝故相朱国桢的《明史》稿本，请人增补了明末天启、崇祯两朝的史事，改称《明书》。因为书中有些指斥清朝的语句，被人告发，清政府把已经死去的庄廷铨开棺戮尸，庄氏家族和为此书作序、校阅、刻印的人，甚至售书者、藏书者和一些地方官吏，都受到牵连，被杀的七十多人，充军边远的几百人。这些大案，显然都是借题发挥，目的是对汉族知识分子，尤其是江南具有反满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镇压，以收杀一儆百的效果。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，清政府又曾下令严禁江南士子结社订盟，可见对他们处处加以防范的。

以《明史》案为开端的文字狱，在康、雍、乾三朝愈演愈烈。康熙六年（1667）的沈天甫诗集案，康熙五十年（1711）的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，雍正三年（1725）的汪景祺《西征随

^① 董含：《三冈识略》。

笔》案，雍正四年（1726）的查嗣庭试题案，雍正六年（1728）的吕留良文选案，都是比较著名的。乾隆朝所罗织的文字狱，就更是多得不可胜数。这是清朝政权趋向稳定以后所必然有的加强思想箝制的一手。

尽管清政府不断调整政策的目的是加强满洲贵族的统治，清政权始终带有民族压迫的色彩，但是清初历史总的趋势是向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方向发展，向恢复社会经济的方向发展，向统一稳定的方向发展。加上康熙皇帝玄烨是个有作为的君主，他在自己长达六十年的统治时间里，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，采取各项有力的措施，使清初的局面从动荡逐步走向稳定。孔尚任的一生，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。

（二）尼山、洙泗之间

孔尚任的家乡曲阜县，在清代是属于山东省的兖州府。这是个古老的帝都。相传远古时代的神农氏、少昊氏都曾在这里建都。周公旦辅佐武王伐纣破殷，被封为鲁公，都城在曲阜。他不愿离开朝廷，让儿子伯禽到曲阜就封。伯禽继承了周公制礼作乐的传统，带来了大量的礼乐典籍。因此鲁国的文化，在春秋列国中是最为发达的。因为是鲁国旧疆的关系，曲阜又称为鲁城。以后在历史上，它还有过鲁县、鲁郡、任城郡、汶阳、仙源等名称。

曲阜县境宽28公里，长38公里。甌山（又名九仙山、九

峰山)雄踞西北, 尼山耸峙东南; 泗水北环, 沂河西注, 洙水南流; 又有防山、戈山、石门山、女陵山之胜。这里是孔子的诞生地。

孔子名丘, 字仲尼, 生于公元前551年(周灵王二十一年), 卒于公元前479年(周敬王四十一年)。他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, 一方面努力维护周公为周王朝所制定的礼乐制度——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, 主张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, 各守名份, 不相僭越。一方面又主张对周礼要有所“损益”, 以适应社会的发展; 大力宣传“忠恕”、“爱人”的“仁”的学说。这种维护剥削阶级统治而又带有改良主义温和色彩的政治思想, 博得了后世地主阶级统治者的赞赏。加上他在思想、教育、文化上作出的杰出贡献, 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对后世的巨大影响, 使他赢得了“万世师表”的“圣人”地位。远在汉高祖十二年(公元前195年)冬, 刘邦平定淮南王英布, 归途经过曲阜, 就“以太牢祭祀孔子”。其后, 汉武帝罢黜百家, 独尊儒术, 孔子的地位更骤然提高。从汉平帝元始元年(公元1年)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开始, 历代帝王封谥不绝, 祭孔已成为帝王经常性的祭祀之一。由于历代统治者的修建, 曲阜的“圣迹”也就特别的多。这里简单介绍几处地方, 以便我们了解孔尚任半辈子生活的环境。

曲阜最显赫的地方是孔庙, 又称为“至圣庙”, 在县城正南门内。这里原来是孔子的故宅, 只有三间屋子。孔子死后一年, 鲁哀公把它改建为庙, “岁时奉祀”。经过两汉以后历代帝王不断的重修、扩建, 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。它占